

后现代的道德回归

——齐格蒙特·鲍曼的伦理思想述评*

周发财¹, 郭毅²

(1. 重庆科技学院人文社科系, 重庆 401331; 2.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编辑部, 重庆 401331)

摘要: 伦理和道德问题是鲍曼的重要议题。现代, 道德是伦理的产物, 现代社会面临道德危机; 后现代, 伦理呼唤道德冲动, 伦理危机为道德复兴提供了机会和新的挑战。鲍曼依据列维纳斯伦理思想的启示提出了自己的伦理观, 企图从现代伦理的内部去解构其机制, 但又发现“对他者无条件的责任”之现实困难, 生发道德感的替代机制还需继续寻找。

关键词: 现代性; 后现代性; 伦理; 道德

中图分类号: B8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09)05-0012-04

作者简介: 周发财(1978-), 男, 湖南人, 哲学博士, 重庆科技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

郭毅(1975-), 女, 重庆人, 哲学硕士,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编辑部。

齐格蒙特·鲍曼是当代论述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 伦理和道德是他的一个重要论题, 在其著作《后现代伦理学》和《生活在碎片中——论后现代道德》中, 对伦理和道德问题进行了详细探讨; 在他的其他著作, 如《现代性和大屠杀》、《个体化的社会》、《寻找政治》中, 都不同程度涉及到伦理和道德问题。本文试图顺理鲍曼的伦理道德思想, 找出其梗概, 并做出适当评价。

一、现代: 伦理时代——道德危机

鲍曼认为, 伦理, 即道德规范, 是现代的产物。在前现代, 对道德的引导和教化工作是由宗教来完成的, 启蒙运动一开始, 哲学家们就对宗教和天启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取得了两项属于现代革命组成部分的成果: “使建立在无视普遍人性(或者直接压迫人性)基础上的教会权威非法化; 证明被现在负责提高和守护国家道德的开明的普遍代言人所造成的空虚状况的填充物之合法性”,^{[1](P25)} 哲学家取代传教士成了道德的代言人, 他们“在认为把约束全人类(所有身

份、民族、种族的人)的道德置于一个不可动摇的根基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上是观点一致的”,^{[1](P25)} 他们也找到了这个根基——理性。理性责无旁贷地扮演起了宗教原来的角色——道德立法者。现代性的信仰首要就是理性, 在理性的指导和规划下, 一个美好有序的社会将实现。当然, 在这样一个社会,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是道德的(善良的), 全社会应该遵循着同一个道德规范, “这种信念就是相信一种无矛盾、非先验的伦理法典的可能性”^{[1](P9)}。现代社会在这种信念的激励下, 以立法的方式炮制出了普遍的、统一的伦理规则, 所以现代是伦理的时代, 伦理先于道德, 而“道德是伦理的产物, 伦理规范是生产方式, 伦理哲学是工业技术, 伦理说教是道德工业的实证主义; 善是它计划获得的收益, 罪恶是它生产中的废品或副产品”。^{[2](P34)} 这样就由伦理规则全面接管了道德能力和道德冲动, 道德名存实亡, 而伦理规则的“立法权”是掌握在哲学家、伦理学家等少数人手中的, 大多数人已经丧失了道德自主权, 一个最主观的事物变成了客观, 一个人要想是道德的, 只需遵守伦理规范; 也唯有遵

守了伦理规范,才可能是道德的。这就是现代的道德危机,道德已被伦理全面取代。

那么,现代社会又如何能抑制人的道德冲动,而使统一的伦理法典行之有效的呢?它是依靠两种理性——程序理性和工具理性——产生的两种伦理——职业(工作)伦理和商业伦理——来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职业伦理的用武之地是现代组织,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官僚体系和商业组织,鲍曼认为“现代组织是一种为使人的行为免受行为者个人的信仰和感情影响而设计的新发明。在此,纪律是唯一的责任,它排除了所有的其他责任,详细地说明一个人对其组织的职责的伦理准则取代了那些可用来处理成员的行为的道德问题,换句话说,现代组织是做那些不受道德约束的事情的一种方式”。^{[2](P261-262)} 职业伦理的主要表现就是服从,做你的岗位设定的或上级命令你做的,你的道德感情必须锁在家中的抽屉里。鲍曼通过对米格拉姆(Milgram)试验^①的分析指出“他发现,残酷只是微弱地与执行者的个性相关,而实际上却非常紧密地与权威和下属的关系,与我们正常的、每天都碰到的权力与服从的结构相关”。^{[3](P153-154)} 在实验中的权威和权力来自科学和实验员。这种职业伦理导致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后果,一是责任的流动性,因为处于组织中的职业都是按规则或命令行事,随着劳动分工的越趋精细,任何一个后果的产生都涉及很多相互辅助的工作和工作人员,所以责任就失去了承担者。第二个后果鲍曼称为不置可否的中立化(adiaphorization),就是组织中工作人员的工作是免于道德评价的,不存在好与坏的问题,而只是正确和错误执行了命令或纪律的问题。所以艾希曼的律师会辩护说他仅仅是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可以看出这两个后果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这种职业伦理正是大屠杀得以可能的重要条件,正是当时德国严密的官僚体系导致了道德失范。这种官僚体系不仅导致了责任流动和道德中立化,而且因为它的分工和程序性,使很多工作丧失了与残酷结果的直接联系,工作在办公室完成,而结果发生在遥远的奥斯维辛。这种“远处行为能力”大大减轻了道德震撼力,米格拉姆实验也证明了这点。并且,因为组织中的大多数行动者不是与人打交道,而只是与事物的某些方面、特征、统计数据打交道,所以行动所指向的对象的伦理主体地位经常被忽视,他们不被作为“人”来对待;正是这些原因的交集导致了在大屠杀中的道德失范。

工具理性的主要标准是效率,它正是商业所追求的,充分利用资源以达最大产出就是商业原则,浪费资源、低效率都是罪过。家庭和商业的分离是商业得以发展的前提,因为商业逻辑是要对效益以外的其他一切事物忘却或漠视,特别是感情,而道德冲动是要坚决排除的重中之重,这就是商业伦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诚实,效率的诚实,因为效率的追求必须要一个诚实的环境。商业伦理的后果就是抛弃一切道德冲动。在大屠杀的例子中,为什么由刚开始的迁移发展到后来的“从身体上消灭”,因为这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最符合工具理性的算计。

鲍曼借用英国作家奥威尔(Oswell)的“一只永远践踏

人类的脸的靴子”来形象化官僚机构对道德的损害,并类似地创造了“永远阻止人类的脸被人看到的眼罩”来比喻同样损害道德的商业,它们产生的后果就是“日程表上去掉了道德事务”。这样现代社会就有效地用伦理取代了道德,这也是现代性宏伟蓝图的必然结果。

二、后现代:伦理危机——道德机遇

鲍曼认为社会现实运动给出的答案是现代性不仅不是“未竟的事业”,而是彻底失败了,希特勒失败了,苏联失败了,对秩序的追求并没有带来更多的有序,混乱如影随形,不确定性、模糊性、不可决断性等现代性发誓要消灭的东西依然如故。作为现代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伦理工程也不例外地碰到了问题,许多思想家惊呼“后现代伦理危机”,鲍曼指出这种伦理危机是“需求和供应的矛盾”,^{[1](P17)} 而供不应求的商品就是伦理规范。为什么会出伦理规范的供不应求呢?我们从鲍曼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就像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性一样的伦理困境;二是社会生活的不断碎片化,责任的不断私人化。

即使有着完善的伦理规范,道德行为最后还得要由行为者的选择来完成,也只有行为者的选择才能完成。即使面对可怕的灾难性后果,行为者还是可以选择不服从,这种选择是完全自由的,也是极端私人的。事实上,此种选择自由也正是法律的伦理规范存在的前提,因为很多人选择恶而不是善。在理性为道德立法的初期,一个普遍的、统一的权威能够有效产生并得到服从。但是,就像理性在追求秩序时做出的划分一样,伦理规范不断地划分道德的和不道德的、善的和恶的,最后不是带来了更多的普遍性和统一性,而是带来了多样性和混乱。社会现实也在揭示“似乎有太多的令人感到安慰的规范:它们以不同的音调讲话,一种规范所称赞的正是另一种规范所谴责的。它们相互冲突和矛盾,每一种规范都主张另一种规范拒绝的东西为权威”^{[1](P20)}。有人可能会说,这不仅不是供不应求,而是供过于求。但是从它无法提供一种统一的,能作为人们的道德选择所依靠的伦理规范这一现代要求来说,它正是供不应求的。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就是:伦理规范力量相互抵消,道德重新从伦理规范中解脱出来,道德再一次成为私人事物,道德选择后果的责任被要求行为者来承担,责任不再是流动的,而是明确的。

鲍曼认为,与现代的生产者角色不同,后现代是一个消费社会,只有成为一名有能力的消费者才是合格公民。在后现代的消费生活中,游戏规则在游戏过程中不断变化,保

① 在实验员的指导下,以科学的名义,以电击、鞭打等方法残害被实验对象,在电击这种喻距离的情况下,当被告知电压不足以造成对象的永久性伤害时,随机找来的人都会打下电闸,在近距离的鞭打情况下,出现一定的拒绝率,当实验人员故意对实验方式表示分歧出现争吵时,一般都会拒绝参与实验。

持游戏的简短和谨防长远是一切理性行为的指导原则,在后现代,“不把自己的一生仅仅献给某一个使命。不发誓永远忠于任何人和事……不让过去的事给现在带来压力,简言之,就是对现在掐头去尾,使它从历史中完全脱离开。废除时间的其他一切形态,而只将它作为当前时刻的一种集合或一种任意的结果;使时间的流逝平衡得成为一种连续的现在”,^{[2](P89)}这样,生活就成了时间的碎片。鲍曼用朝圣者来比喻专注于身份建立的现代生活,而“后现代生活策略的中心不是建立身份,而是逃避限制”,^{[2](P89)}对于这种恐惧束缚和固定的后现代生活策略,鲍曼认为漫步者、流浪者、观光者和比赛者的联合是一个合适的比喻,这四种人并不是后现代发明的,他们只是从边缘走向了中心。漫步者是悠闲的人,在悠闲时光中漫步,把人生现实排列为没有过去和结果的事件,购物中心是漫步者的天堂;流浪者是现代秩序追求的敌人,花园中的杂草,他们没有目的地,没有预定的旅程,对他们流经地的定居者来说他们是陌生人,但现在的城市就是陌生人的集合,“世界正在按流浪者的标准将自己零售”;观光者的心声是“我需要更多的空间”,表达的是对家的束缚的不满。比赛者的忧虑是比赛总是从起点开始。这四种形象“都倾向于将人际关系变成破碎的(想想那些简化成一种简单职责和服务的‘纯粹’关系)和不连续的;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拧成一股绳’和持续久远的影响”。^{[2](P100)}这种后现代生活的碎片化导致了伦理规范供不应求,使行为和伦理规范间出现了空隙。

鲍曼虽也为后现代伦理危机的出现而高兴,但并没有欢呼“干什么都可以”,没有主张伦理虚无主义。他认为,正是伦理规范的供不应求,为道德提供了填补伦理空隙的机会,为道德从伦理规范的坚硬盔甲中解放出来、使道德重新个人化提供了契机。另外,偶然性、不确定性、模糊性等现代社会要根除的特征之后现代胜出,也直接动摇了伦理规范的普遍性、统一性神话,这种“后现代对世界的‘返魅’也将道德从其现代流放中接纳回人类世界,重新恢复了它的权力和尊严,抹平了被诽谤的记忆和由于现代的不信任而留下的屈辱”。^{[1](P33)}

但是,鲍曼并不认为在后现代状况下道德就必然会复兴,事实上,道德也面临着很多危险。首先,在现代社会状况下威胁着道德的许多伦理规范还继续在起作用或是变相存在。随着科技的发展,远处作用能力进一步加强,对象的道德主体地位更会被漠视;随着市场和资本势力的扩张,商业伦理变得无孔不入;极权主义不再存在,但许多“分散的、小规模然而却是多元的和普遍存在的压迫”被繁殖,“伟大的确定性已经被驱散——但是在被驱散的过程中,它分裂成为大量小的确定性,这些小的确定性反而更加野蛮地黏附于它们微小的组成部分上”。^{[1](P239)}其次,虽然伦理危机留下的空隙为道德的填补提供了契机,但在后现代状况下道德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对手——美学。在后现代状况下的人“将他者首先视为一种美学的对象,而非道德评估的对象;视为一种体验,而非责任关系”;^{[2](P100)}鲍曼认为,社会空间由认知、美学和道德空间组成,由于它们有着各自不同

的逻辑,它们是相互竞争的,认知空间和美学空间不可避免地分割道德空间,在后现代的消费主义社会中,这种情况显得更为严重,因为人们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满意的消费者,“社会存在于个体寻求和发现对个人需求满足的过程中。认知空间首先是一块牧场,美学空间则是一个游乐场。人们既不要求也不寻求道德空间”。^{[1](P244)}所以,对道德而言,后现代是危机和机遇并存的。

三、道德乌托邦:对他者的责任

鲍曼认为大屠杀的一个重要理论启示就是必须寻求道德的前社会根源,他指出了三种这样的理论,一种是在处理“与他人相处”时不考虑道德问题,以手段——目的模式处理的理论;第二种是萨特式的“他人即是地狱”的焦虑;第三种是列维纳斯式的“对他者的无条件责任”。鲍曼选择了列维纳斯,因为他也强烈期盼道德的复兴。“对列维纳斯来说,‘与他人相处’这种人类存在最基本和不可撼动的特征首先意味着责任…我的责任是他人对我而言的一种、也是唯一的一种存在形式”,^{[3](P182)}这种责任是无条件的,是不受任何非道德因素影响的。在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过程中,有些犹太委员会委员不愿为了自保而做纳粹的帮凶把其他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而自杀乃至全家一起自杀。鲍曼认为这样的事实表明自保并不是必然凌驾于道德之上的,在伦理学的视角,道德先于本体。鲍曼根据列维纳斯的这种思想,提出了他的伦理学主张:1.人在道德上是善恶并存的,善恶面对面地存在于人的“最初场所”中心;2.道德和道德现象在本质上都是非理性的,不适用理性算计;3.道德具有无可救药的先验性,任何在社会中找到的根基都是错误的;4.道德不能被普遍化,但他也反对道德相对主义,不能普遍化不等于相对主义,后现代伦理学并不主张道德相对主义;5.道德责任是第一位的,它不是社会的产品而是社会的基础。

列维纳斯构建的道德场景有点类似于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罗尔斯是用“无知之幕”把原初状态中的人罩起来,这些人对他们的自身状况一无所知,而列维纳斯干脆把他们消解了,我和他者都是没有社会地位、职位、财富、名誉等等特征的人,列维纳斯把人还原成了赤裸裸的人性。但是列维纳斯得出的不是罗尔斯的社会正义问题,反倒是诺齐克式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道德复兴的场景。鲍曼指出,虽然列维纳斯也认识到了他的“对他者的无条件责任”只适合于纯粹的道德场景,走出道德场景之外就必须求助于社会正义,但他没有对此做详细探讨,列维纳斯虽然希望国家机构的工作致力于促进正义的发扬,但他没有正视“它们的工作也许缺乏道德理想,甚或产生对道德价值有害的后果”,^{[4](P183)}针对这种缺陷,鲍曼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要求政治纲领——不管是政治家的政治纲领,还是更加难以捉摸和不能控制的集中或分散的政治纲领——成为道德责任的一种延伸和制度化”。^{[1](P246)}于是,鲍曼转而希望去寻求一种新的政治伦理,但因为知识分子阶层同样受到后现代

个体化的影响,已经不再是一个有力的整体,虽然这也不是一个坏事(特别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但知识分子阶层也肯定无法成为这样一种新的政治伦理的救世主。鲍曼对知识分子提出的期望是:继续批判地调查后现代道德问题,为道德的复兴做出努力。

鲍曼与其他许多后现代思想家一样,通过揭示出现代社会和现代伦理学存在的危机和悖论,从其内部进行解构;同时,把道德追溯到最源初的场景,企图让道德和伦理摆脱政治的束缚,为道德和伦理寻找新的机制。正如麦金太尔所说的,民族国家与现代家庭都不是能孕育出有德性的人的社会组织,它们的逻辑是利益的较量和绝对的权威,它们没有为人们的道德思考留有余地。在这些地方,即使人们假称在考虑道德问题,也只是无历史感地衡量着身边人或现在人的利益。鲍曼的伦理思想无疑深受列维纳斯的影响,他们的思维可以说十分准确地掌握了当代西方文化的病源,“对他者无条件的责任”是对症下药。但是,这种对他者无条件的责任,仍免不了带有浓厚的主体意味,这种责任立基于主体单方面的道德要求,始终建基于主体与他者的二分,所以似乎未能彻底摆脱现代哲学的假设。

另外,鲍曼虽然也像列维纳斯那样寻找生发道德感的

源初场景,但他也看到了“对他者无条件责任”的现实局限,转而去求助于政治伦理。在《寻找政治》一书中,鲍曼希望创建一种“新共和主义”来克服当代社会的消费主义、全球化和个体化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但这种新共和主义是否能为道德的复兴提供机制,却没有探讨。相对而言,鲍曼伦理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对现代伦理机制的揭示和批判,像后现代的通病,他也未能提出一种新的、行之有效的替代机制。

参考文献:

- [1] Zygmunt Bauman. *Postmodern Ethics* [M].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 [2] Zygmunt Bauman. *Life in Fragments: Essays in Postmodern Morality* [M].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5.
- [3] Zygmunt Bauman. *Modernity and Holocaust* [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 [4] Zygmunt Bauman. *The Individulized Society* [M]. Polity Press in associar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1.

(责任编辑:彭介忠)

On the Restoration of Postmodern Morality

——Commentary on Zygmunt Bauman's Ethics

ZHOU Fa-cai¹, GUO Yi²

(1. *Department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2.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Ethic and morality are important issues for Bauman. Modernity is the product of morality and ethic, and modern society is faced with moral crisis. In a postmodern era, ethic calls for moral impulsion, and ethic crisis has provided chance and challenge for the recovery of morality. Enlightened by Levinas's ethics, Bauman proposes his own ethics, trying to deconstruct its institution from the interior of modern ethics. However, he is puzzled by “the unconditional responsibility to others”, and he has to look for new substitution mechanism to produce the moral intention.

Key words: modernity; postmodernity; ethics; morality